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

——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姜 鹏

(复旦大学 历史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其注释、订补、改写、续写之作不断出现。明代学者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订补著作。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汉景帝后元三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元年这一段历史书写中,司马光采取了史实叙述与相关评论前后颠倒、错置,并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借用、删节以凸显己意的手法,用于表达自身的施政理念。严衍发现了这段文本中史实与评论颠倒、错置的问题,也发现了司马光对文献的删节使文献失去了原有意义,故在《资治通鉴补》中对这段文字进行了秩序调整,使之符合一般的书写逻辑。同时也将置于原书卷十六末尾一段借用自《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删去,并根据《汉书》原文增补了卷十七开头经司马光删节的董仲舒《天人三策》。本文在分析、比较《资治通鉴》原文与严衍改订后的文字的基础上,指出《资治通鉴》中很多看似有“破绽”的地方,其实隐含了编纂者表达自身理念的深意。对其订补、改写反而消解了文本的原有写作语境,使作者力图借历史叙述予以表达的施政理念湮没不显,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叙述文本。

【关键词】司马光 严衍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补》

一、引言

明代学者严衍(1575~1645),曾对《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的“多所阙略”表示忧虑,在朋友门生的帮助下,他花三十余年精力作了部《资治通鉴补》(以下简称《通鉴补》),对原著“阙者补之,讹者订之”,用功甚勤。^①在查漏补缺,并帮助原著完备体例等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深得当时和后世学者的好评。如《通鉴》原文叙事有头无尾、有尾无头,或一人讹而为二,二人讹而为一,或一事重出,或大事遗漏,等等。《通鉴补》一一予以订正,可谓《通鉴》功

臣。^②主盟乾嘉史坛的钱大昕,与严衍同为嘉定人,为乡先贤作传,就称赞他与助手谈允厚“于史学皆实事求是,不肯妄下雌黄,其所辩正,皆确乎不可易”,最终将这部书拔高到“其有功于《通鉴》者,胡身之而后,仅见此书”的地位。^③

但严衍对《通鉴》所作的补正都是合理和必要的吗?《通鉴》中很多看似破例、遗缺,乃至“误用”野史的地方,是否都由司马光等人的疏忽造成?都需要纠正?本文拟以严衍对《通鉴》原文卷十六末汉景帝后元三年(BC. 141)、卷十七开篇汉武帝建元元年(BC. 140)所作的改动为例,讨论这一问题。通过讨论,笔

【作者简介】姜 鹏,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中的《资治通鉴》”(项目批准号:09YJC770006)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黄淳耀《吴郡严先生通鉴补序》,光绪二年思补楼校印本《资治通鉴补》收入首都图书馆编《通鉴史料别裁》第四册,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② 谈允厚《资治通鉴补后序》,载《资治通鉴补》,前揭版本,第10~14页。

③ 钱大昕《严先生传》,《潜研堂集》卷三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2009年,第672页。

者想指出,《通鉴》很多看似有“破绽”的背后,往往蕴藉着史文以外的深意。包括严衍在内很多学者试图对其作出“修正”,这些“修正”后的文字看似更为完备,实则妨碍乃至掩盖了原文深意的展现与表达。

《通鉴》卷十六以汉景帝后元三年收尾。这一年正月,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即位。根据《春秋》“一年无二王”的原则,汉武帝没有当即改元。所以《通鉴》

将汉武帝这一年的活动归置在景帝之末,而不挪到下一卷作为武帝时代的开始。但细读《通鉴》这一年中的文字,会发现它在相关段落的顺序安排上,有违反通例的地方。以至于严衍在作《通鉴补》时,认为有对原文顺序作出调整的必要。此外,他也对这两卷内容作了些删补工作。为方便说明问题,我们把《通鉴》与《通鉴补》相关文字录出,列表如下。

表 1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补》	
卷十六 汉景帝后元三年	(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继以孝文、孝景,清静恭俭,安养天下……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卷十六 汉景帝后元三年	(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初,王太后在民间为金王孙生女。及为皇后,讳言之。帝既立,弗知也。韩嫣乘间白言…… 韩嫣者,吕高侯孽孙也……
	(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①		[辛丑]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②

表 1 中,左边誊录的是《通鉴》原文,右边是《通鉴补》改订后的文字。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三处重大差异。第一,《通鉴》引用了班固对汉景帝的总结,但既没有把这段话放在景帝驾崩条后,也没有放在安葬景帝条后,而是放在了汉武帝封两位母舅为侯的记载后。严衍认为这个顺序不合理,因此将班固对汉景帝的总结前挪,置于景帝崩、武帝即位条后,而在汉景帝安葬条前。第二,《通鉴》在卷十六末尾有“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不仅总结了汉初社会经济的变化状况,还预先对即将展开叙述的汉武帝时代的社会

经济状况作出“天下萧然”的负面评判。严衍将这段文字删去,另补两段文字。一段用以补充说明汉武帝母亲复杂的家庭关系,另一段用于介绍将王太后相关事实告知汉武帝的韩嫣。以上两处差异都在卷十六末尾,第三处差异在卷十七开篇,内容是关于董仲舒的对策。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司马光在收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时,作了大幅度删节。严衍却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原文,将删去的文字重新恢复。严衍补足的文字,我已在上表中用下划虚线标出。下文将对这三处差异逐一讨论,看严衍的改动是否合

① 《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第546~549页。

② 《资治通鉴补》,第256~257页。

理,司马光采取这样的表述是否有其他目的?

二、《通鉴》崩殂君主赞评书例

先考察第一个问题。司马光为何要将总结汉景帝的文辞置于汉武帝封舅的行为之后?严衍的质疑、改动是否合理?

《通鉴》叙西汉史,引用过班彪、班固对六位君主的赞词,这六位君主分别是:景帝、武帝、宣帝、元帝、成帝、平帝。我们可以比较这六份赞词的安插位置,看《通鉴》在处理同类问题时是否有规律可循,景帝赞词的置放又是否合例。《通鉴》中与景帝赞词有关的上下文已见于表1,现将与其他五位君主相关的文辞誉录如下:

武帝后元二年(BC. 87):

(二月)丁卯,(武)帝崩于五柞宫,入殡未央宫前殿。

帝聪明能断,善用人,行法无所假贷。……

班固赞曰: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①

宣帝黄龙元年(BC. 49):

冬,十二月,甲戌,(宣)帝崩于未央宫。

班固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②

元帝竟宁元年(BC. 33):

夏,五月,壬辰,(元)帝崩于未央宫。

班彪赞曰:……

匡衡奏言,前以上体不平,故复诸所罢祠,卒不蒙福。……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卫尉、阳平侯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

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③

成帝绥和二年(BC. 7):

(三月)丙戌,(成)帝崩于未央宫……赵昭仪自杀。

班彪赞曰:……

是日,孔光于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绶。……

……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谒高庙。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④

平帝元始五年(AD. 5):

(冬十二月)丙午,(平)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葬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三年。奏尊孝成庙曰“统宗”,孝平庙曰“元宗”。敛孝平加元服,葬康陵。

班固赞曰:……

以长乐少府平晏为大司徒。

太后与群臣议立嗣……^⑤

①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第746~748页。班固和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论,在下文讨论中仍将引用,故全文录出,以下几条,只标明“班固(彪)赞曰”的位置,相关文辞省略。

②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第892页。

③ 《资治通鉴》卷二十九,第951~952页。

④ 《资治通鉴》卷三十三,第1053~1055页。

⑤ 《资治通鉴》卷三十六,第1155~1156页。

通过排比,我们可以发现,将总结陈词置于“帝崩”条后、太子即位及大行安葬之前,是通例。武帝、宣帝、元帝、成帝的赞词安置,都符合这个通例。平帝崩、葬连书,而时无嗣君,班固赞只能置于“葬康陵”后,情况稍有特殊,却并不影响整体判断。相比之下,把景帝赞词拖到武帝封母舅之后,不合通例。这不仅是《通鉴·西汉纪》中唯一的例外,也是全书仅见的例外。正因如此,严衍在《通鉴补》中将这段赞词的位置进行了调整。从整齐体例的角度看,严衍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我们的疑问是,司马光为什么要出这个变例?是不是因为《通鉴》原文中景帝赞词置放位置不合通例,我们就能遽下断论,说这是司马光的疏忽和差错?景帝赞词位置“出律”,是否可能另有用意?

皇帝驾崩,史家总结,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太子即位,封官赏爵,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通鉴》将崩殂君主的赞评之辞置于“帝崩”条下、太子即位条前的通例,使新旧时代粲然分明。其卷十六对景帝末、武帝初的处理作为一个变例,在时代划分上又起到什么效果?不妨再作一表,来讨论这一问题。

如表2所示,左栏择取《汉书》卷五《景帝纪》、卷六《武帝纪》中的相关文字,作为纪传体划分时代方式的代表,与编年体作一比较。中间一栏是经过《通鉴补》处理后的景帝后元三年书写形式,我们可以用它来代表《通鉴》处理相关文题的通例,论证已见前。我对这部分内容又作了两个处理:一是在“班固赞曰”结束的地方,打了一条虚线,把这段内容分成上下两部分;二是将这段文字进一步虚拟成《通鉴》全书中最典型的通例样式,即将“太子即皇帝位”这段文字虚拟下移,置于“班固赞曰”之后,在这段文字的原处位置上

表2

《汉书》		《通鉴》通例		《通鉴》变例	
卷五《景帝本纪》	（景帝后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遗诏赐诸侯王、列侯马二驷，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钱。出宫人归其家，复终身。二月癸酉，葬阳陵。 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①	《通鉴补》卷十六	（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通鉴》卷十六	（正月）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孝武皇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岁，立为胶东王，七岁为皇太子，母为皇后。十六岁，后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胜皆为列侯。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②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初，王太后在民间为金王孙生女。及为皇后，讳言之。帝既立，弗知也。韩嫣乘间白言…… 韩嫣者，弓高侯孽孙也……		《通鉴》卷十七

①② 《汉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第153、155~156页。

加中括号,虚拟位置上加打阴影,以示区别。^①右边一栏,照录《通鉴》卷十六末尾、卷十七开篇的文字,是《通鉴》崩殂书写的变例。

对比左中两栏,纪传体以人为叙事载体,一纪一主,前后两个时代藉由卷帙安排截然分开,标志非常明显。中间这一栏里,景帝和武帝时代的分界线也很好找,就在打虚线的地方。班固的“赞曰”往往是一套总结陈词,《汉书》中通常处于每卷终篇部分,为该卷殿尾。当这类总结某位既崩君主的“赞曰”被移到《通鉴》这样的编年体史书中,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暗示人们属于旧君主的时代已结束,需要在此作一总结。随着下文“太子即位”,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所以我在这栏“班固赞曰”结束的地方打出一条虚线,这整段内容并不分散于不同的卷帙,而是同出于《通鉴补》卷十六。若以这条虚线为界,我们就很容易将上下两部分内容理解为两个时段,亦即在虚线上方的,仍属于汉景帝时代,而在虚线下方的则进入汉武帝时代。严衍若能不那么保守谨慎,按原著通例对这段文字进行彻底修正,将表2中括号中的内容挪至打阴影的那个位置,那么这条虚线的分界作用就会显得更加明白,由这段“班固赞曰”将景帝时代和武帝时代截然分开。这样,编年体虽然不能像纪传体那样,依靠本纪卷帙的分别,非常简明又非常确然地分出前后两帝的不同时代,但它却能借助类似于“班固赞曰”这样的段落,达到区分时代的目的,形成和纪传体相近的效果。^②

但《通鉴》在卷十六景帝后元三年这里,没有按这个思路处理,成为全书唯一的变例。我在表2右栏上半部分内容中,打出了两条虚线,都是可能对新旧时代作出区分的地方。最终我们发现,用这两条虚线中的任一条来区分景帝和武帝时代,都是不合适的。第

一条虚线打在景帝崩的相关记载后,试图以君主自然生命的终结作为划分凭据,但作为总结陈词的“班固赞曰”落在了这条虚线的后面。第二条虚线打在“班固赞曰”结束后,我们又发现在此之前汉武帝已经开始行使他的权力了。而在这条虚线后面,本卷也只剩下“汉兴,接秦之弊”这么一段孤零零的文字,无法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开端。所以,在《通鉴》该年的原有书写格式下,无论我们怎么切分,都无法划出令人满意的新旧时代切割线,原因就在于《通鉴》原文对“班固赞曰”与武帝即位初的行为,进行了颠倒、交错处理。笔者以为,这一颠倒、交错,是作者特意设定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从汉景帝到汉武帝的过渡,不是仅由帝位传承造成的时代变迁,而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转折。从汉景帝到汉武帝,汉朝国策、对外关系、社会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剧烈变化。而汉武帝这个时代,恰好是司马光有针对性地重点叙述的时代(对这种针对性本文会在最后司马光施政理念的部分予以讨论)。所以如何叙述汉武帝的时代,以怎样的形式让这个时代开始,司马光都需精心设计,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景帝后元三年的书写。司马光把汉武帝即位初的封赏行为放在“班固赞曰”之前叙述,和汉景帝的崩逝一起停留在大转折到来之前,而不让这些琐碎事件来拉动武帝时代的序幕。在“赞曰”之后,司马光安排了“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就把这一卷内容结束了。出现在下一卷开端的,是建元元年董仲舒对策事件。从这个结构来看,我们要找出《通鉴》中景帝和武帝时代的分界线,还是以十六卷的结束为标志,比较合适。“汉兴,接秦之弊”和董仲舒对策这两段文字,一在十六卷篇尾,一在十七卷篇头,都是司马光重点表述的内容。它们也各自承担着终结汉初时代、开启武帝时代的功能。

① 与汉代其他几例相比,围绕景帝与武帝之间帝位交接的文字记载,有一个稍显特殊的地方,那就是在其他几例中,皇帝崩与太子即位不发生在同一天,可以分开书写,中间不仅可以插入赞词,甚至可以夹杂其他叙事。而景帝崩与武帝即位发生在同一天,鉴于原文(景)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是连续书写的,中间若插入赞词,要将这一条记录破开。严衍没有将此句强行破开,而是将“班固赞曰”置于景帝驾崩、武帝即位条后,景帝安葬之前。综检《通鉴》全书,我们发现严衍不强行破句的处理,是偏于保守的。东汉章帝崩、魏文帝崩,与各自的太子即位,都在同一天,《通鉴》却将它们破开,先引用前代史家的评论,再书太子即位。参《资治通鉴》卷四十七章和二年(AD. 88)二月壬辰条,第1513页;卷七十黄初七年(AD. 226)五月丁巳条,第2228页。这两条内在例证说明,即便君主崩殂与太子即位发生在同一天,也可以破成两条记录,以便于中间插入评论。由此可见,将总结陈词置于君主崩殂之后、太子即位之前,是《通鉴》全书适用的通例,无论这两件是否发生在同一天。严衍若想将《通鉴》卷十六的文字彻底调整为合乎通例的顺序,不妨将(景)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这句话破开,中间插入“班固赞曰”。

② 所不同的是,在《汉书》中,安葬景帝虽然发生在武帝即位之后,但根据以人为叙事载体的原则,这是最后一件与景帝本人有直接关系的大事,故《景帝纪》将它作为景帝时代的终结,再殿以赞词。编年体以时间为叙事线索,既然在汉武帝时下葬,那此事就归入武帝时代,所以它在“班固赞曰”之后。

三、《通鉴》所述汉武帝朝历史的结构安排

《通鉴》卷十六最后一个段落,即“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是非常重要的文字。严衍编《通鉴补》时将它删去,显然没有意识到这段文字的重要性,更没有斟酌它在《通鉴》叙述汉武帝时代时,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这段文字和之前的“班固赞曰”一起处于《通鉴》卷十六末尾,替汉景帝时代压轴。“班固赞曰”的句子并不多,三言两语总结了秦汉易代之际政治、社会发生的最大转变,对汉兴以来的工作成绩予以了肯定,最终将重点落在对文景之治的表彰上。可以说是在回顾汉初历史宏观走势的基础上,对文景之治作了总结,但语言简洁,细节不足。所以紧接其后,司马光又安排了“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虽然在功能上部分地重复了“班固赞曰”所要表达的内容,但用社会经济状况变化的细节,取代了浮词虚誉。

仔细阅读“汉兴,接秦之弊”以下文字,不难发现,其母本出自《史记·平准书》。经过司马光的改写,我们可以把这段文字分为三个意群。第一个意群,强调汉初经济的困难,和与之相匹配的简朴之风。汉朝刚建立之后,“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下,财政预算“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财政支出上,“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接下来的第二意群,表彰了文景之治的功绩,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字。整个社会也洋溢着“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耻辱焉”的良好气氛。以上两部分恰恰也是前文“班固赞曰”所要赞誉的内容。然而富足之后,奢侈、僭越的潮流也开始激荡涌动,于是进入

以揭示“物盛而衰”为主题的第三意群。在这以前的文字,我们都能在《史记·平准书》中找到原文,唯独司马光为第三意群、也是为整个段落收尾的这句话:“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既不见于《史记·平准书》,也不见于《汉书·食货志》。^①这是司马光自己总结的语言。

司马光虽然只加了这么一句话,却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由于这句话的存在,使整段文字在总结性功能之外,兼具了转折性功能。我们看这段文字居处的位置,在《通鉴》卷十六末,景帝时代结束之后,而在卷十七武帝正式改元之前。这样一段文字,处在一个位置上,其承上启下的功能不言而喻。这段话的重点,笔者以为恰恰就是司马光添加的那句批评汉武帝的話,这句话对即将展开叙述的汉武帝时代作了负面预判,具有强烈的暗示作用。严衍将这段文字予以删除,显然没有发现司马光设置这段文字的目的何在。

笔者以为,在《通鉴》中,这段借用《史记·平准书》并加以删改的文字,虽未冠以“臣光曰”或其他“史臣曰”字样,却具有史评功能。它和前引“班固赞曰”一起,不仅承担了对汉朝历史重大转折进行点评的功能,并且在结构上,与卷二十二武帝时代结束时的两段史臣评论遥相呼应。这一呼应结构,凸显了司马光借助汉武帝朝历史进行规谏的匠心。

把《通鉴》卷十六末尾“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看作是未曾冠以“某某曰”的史评,可以从几种《通鉴》版本的书写格式上得到旁证。南宋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是今存较早、流行也较广的《通鉴》刻本。^②由于刻工不同等原因,该版《通鉴》对史评书写格式的处理,前后略显不同,但大体上还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这个版本中,为区别前后正文条目,往往在前一条内容结束后

① 《资治通鉴》,第547~548页;并参《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1417~1420页;《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第1127、1134~1136页。

② 《通鉴》编成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命于杭州镂版,是该书最早的刻本,然此本久不见于人间。绍兴二年至三年刊本则传播深远,《四部丛刊》初编、《中华再造善本》所影印的宋刻本《资治通鉴》,皆以绍兴本为祖本。后世点校整理,也多以为母本。钱曾《读书敏求记》著录有大字宋本一种,傅增湘以为即当时北京图书馆所藏之蜀本(参《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卷二之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29页)。世传尚有百衲宋本《资治通鉴》,合宋刊《通鉴》七种而成(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有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蜀本与百衲本,因限于条件,笔者皆未曾亲见。然据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百衲本亦以吸收前揭绍兴本最多。此外,有一种题识为“兴文署”刊行的元刻本,是今见最早将胡注散入《通鉴》正文之下的版本。然对于此本的来历,历代藏书家、版本学专家颇多质疑(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本,前有清前期藏书家吴城长跋,已有非议。另详日本学者尾崎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版解》“资治通鉴”条,载《斯道文库论集》第34卷,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编行,2000年,第12页上)。笔者曾借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该种元刻本一阅,其中正文虽据绍兴本翻刻,然格式破碎,不成规律,故不置于讨论之列。

空一格,再书写接下来的一条。一般而言,对于冠有“臣光曰”字样,或引用其他史臣评论,如“班固赞曰”、“荀悦论曰”、“陈寿评曰”等文字,相对于正文要多降一格或数格,亦即在前条正文后空两格、乃至更多格,再行书写。卷十六及前后相邻的卷帙,都遵循正文降一格、史评降两格书写的规律。我们看到,在这个版本中,“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未依正文格式书写,而是准史评体例,空两格书写。^① 这种处理方式,至少影响了明代天启五年(1625)陈仁锡点评本和清代文渊阁四库本《通鉴》对这段文字的处理。在这两个版本中,“汉兴”以下,例同前引“班固赞曰”,空两格书写,以区别于正文。^② 由此可见,的确有不少学者将这段话视作具有史评功能的文字。尤其是绍兴刻本的处理方法,颇具说服力。今天虽然看不到《通鉴》原稿,北宋元祐元年(1086)镂版于杭州的祖刻本,也歿世已久,因此无法确定绍兴本与元祐本之间的关系。但绍兴二、三年开雕之际,主事者去北宋未远,作如此处理,当有所本。^③

从史评的角度,重新考察“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与前引“班固赞曰”共同置于卷十六末尾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如前所述,这两段文字在描述和评论汉初社会经济发展上,有很大的重复。司马光运用两段不同的文字反复陈说汉初社会由动荡而安泰、经济由贫困到富庶的变化,加强了读者在这方面的意识。但他却在最后,用“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这么一句话,使文意发生重大转折,暗示着汉武帝即位后,汉代社会经济有一个从安泰到动荡、从富庶到贫困的反动过程。到第二十二卷完成汉武帝时代的叙述时,司马光同样安排了两段史臣评论,对这个时代进行总结,与卷十六末尾的两段论评遥相呼应。这两条评论,一条仍然引用班固在《汉书》中对汉武帝的总结,另一条则冠以“臣光曰”,是司马光自己的评说(见前文第二部分“《通鉴》崩殂君主赞评书例”所引)。^④ 班固的总结,尽管倾向于肯定汉武帝的功绩,但最后也不得不

指出,汉武帝在“恭俭”一节上,有亏前圣。而司马光劈头就讲“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斂,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几乎对汉武帝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司马光的批评切入点很丰富,但归结起来还是可以纳入《通鉴》卷十六末尾已经指出的核心问题:经济富庶、社会安定的局面,在汉武帝统治过程中遭到了破坏。《通鉴》对汉武帝统治时期的具体叙述,就夹处在卷十六末尾的评论和卷二十二尾部评论之间。这一呼应结构,加强了司马光对汉武帝时代特点的定性,而这一做法的本质,是在否定那些大量消耗社会财富的政策与行为,其中包括国家扩张与帝王的个人挥霍。对汉武帝时代进行反面定位,并加以凸显,具有针对现世的讽喻意义,司马光借此表达了自己的施政理念。具体讨论将在本文第五部分展开。

综合前文的讨论,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光在《通鉴》卷十六末尾,不以通例安置那段总结汉景帝时代的“班固赞曰”,而是将相关内容进行了颠倒、交错。司马光把汉武帝封舅等无关紧要、且很有可能并非出自武帝本人意愿的行为前移,不让这些琐碎的叙事干扰即将展开的对汉武帝时代的叙述。后挪的“班固赞曰”与“汉兴,接秦之弊”两段文字,重磅压轴,承上启下,在汉初以来的历史与即将来临的汉武帝时代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并且,这两段文字与卷二十二武帝时代结束后的两段史臣评论,遥相呼应,凸显了叙述这个时代的用意。这是《通鉴》精心安排的结构。

严衍在没有意识到卷末两段文字是共同发挥作用的组合式史评的情况下,对史文次序进行调整,将“班固赞曰”前挪,随即造成的问题是:被割裂的“汉兴,接秦之弊”这段文字,无法孤零零地独自存在于卷末。经严衍调整后的史文,先有总结文景之治的“班固赞曰”,再有汉武帝即位封舅等行为,若再在这后面安排一段总结汉武帝之前社会经济状况的文字,在文理上显然不通。故严衍干脆将这段文字全行删去,而

① 《四部丛刊》初编册19,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刻本《资治通鉴》卷十六,第19b页。《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绍兴本《资治通鉴》卷十六,第16a页同。

② 明天启五年陈仁锡点评本《资治通鉴》卷十六,第30a页,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册304,《资治通鉴》卷十六,第303页上。

③ 鉴于这段文字前缺乏类似“史臣曰”的字样,今日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将这段文字抬格,作为正文处理,恐反失其真。参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第547页。

④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212页。《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第747~748页。

代以介绍王太后家史与韩嫣等内容(参前文表1),作为封舅的衍生叙述。殊不知这一挪一删,消解了《通鉴》原有的叙述结构和意图。而围绕着武帝封舅行为所补充的内容,恰是《通鉴》意在淡化的部分,这种反向强化,又干扰了《通鉴》原定重点的展现,适成蛇足。

按《通鉴》原有结构,将汉武帝封舅等事件附赘于景帝之末,而不将它们作为武帝时代的开始,^①还能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为下一卷开头的董仲舒对策腾出位置。《通鉴》卷十六以司马光“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一语煞尾,接下来从第十七卷到第二十二卷的汉武帝时代,以董仲舒对策拉开序幕。这就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考察的问题,司马光为什么要让这个历史事件成为武帝时代的开端?

四、《通鉴》对“天人三策”的处理

“天人三策”最初见于《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将《通鉴》卷十七“建元元年冬十月”条中的董仲舒对策与《汉书》进行对比,很容易发现,司马光对原文进行了大幅度删节,并把三份对策合而为一。更重要的是,经删节,这份对策的主题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其说是董仲舒的对策,不如说是司马光的对策。

读《汉书》可知,董仲舒的三策,和汉武帝之间有一问一答的关系。故先有汉武帝三问,后有董仲舒三答。而董仲舒的答又与汉武帝的再问有一定互动关系。汉武帝第一问“欲闻大道之要”,除礼乐制作外,也涉及灾异符命,故制词中有“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等语。于是探讨礼乐制度与天人关系,成为董仲舒应答的双重话题。第二策中,汉武帝与董仲舒的问答集中在礼乐刑措和农业生产。第三次问答中,天人关系及其历史迹应成为焦点话题。汉武帝的制词开头就说“善言天者,必有徵于

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成为发问前提。^②综观三策,虽然都是围绕着寻求长治久安之道的君臣对答,但展开论述的角度是多层次的。礼乐制作、刑政德教、农业生产、天人灾异,都是探讨治道必要的角度。在讨论过程中,董仲舒的陈述固然是主体,但汉武帝发策制问,作为角度设计参与者的身份,也不可忽视。在君臣互动间,我们可以探得当时政治观念的底蕴。对天道的敬畏,对灾异频现的焦虑,体现了协调天人、关注君权与神权之间的屈张,是当时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石。所以探讨天人关系,虽然不是这三份对策的唯一主题,却也是君臣倾心关注的重要话题。其他礼乐制作、刑政德教等主题,反而可以从天人关系的角度予以派生。这也是后人将这份文献命名为“天人三策”的依据。

但这份文献被载入《通鉴》时,司马光不唯将汉武帝的三问尽行删去,只统括为“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一语,^③且对董仲舒策文进行了选择性删节,原文中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几乎删削殆尽,而关于礼乐教化的内容,成为重点保留对象。这就使得三策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多元化主题,近乎趋向一元。三策中,因为第二策本来就谈礼乐刑措为主,很少涉及天人关系,笔者打算以第一策、第三策为讨论对象,在《通鉴》刊落、保存的文字中,各举一些典型段落、文句,列表对比,用以说明“天人三策”的主题如何在司马光的裁剪下发生变化。

通过对比下表左右两栏中的文字,很容易发现主题的转移。下表第一策(1)和(a)两段文字,分别是《汉书》版“天人三策”和《通鉴》版“天人三策”开篇定调文辞。^④前者谈灾异天人,后者谈礼乐教化。虽然以礼乐教化为关键词的(a)段落,也是从《汉书》原文中截出,但《通鉴》将《汉书》中以天人关系为核心议题的开篇段落删除,直接将主张礼乐教化的(a)段落升格为篇首,对读之下,旨趣迥异。

① 在这一点上,《通鉴》卷十六末尾景帝赞词的位置,与卷二十二末尾武帝赞词的位置,尤其具有可比性。同样是在卷末,同样是前一任帝王统治结束,新皇登基、施行权力而未改元,卷二十二末尾却将昭帝即位后的行为放在武帝赞词之后,让武帝和昭帝两个时代,前后界线分明。这更说明,卷十六末尾不合通例的处理,是司马光有意为之的。参《通鉴》卷十六,第546~548页;同书卷二十二,第747~748页。

② 所引原文,皆见《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2495、2496、2513页。

③ 《资治通鉴》卷十七“建元元年冬十月”条,第549页。

④ 《汉书》第2498、2499页,《资治通鉴》第549页。

表 3

	《汉书》原文具有、而被《通鉴》删除的文字	《通鉴》保留的文字
第一策	(1)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2)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3)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	(a)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b) 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c) 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第三策	(1)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	(A)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虐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再对照第一策中(2)和(b)两个段落。^① 同样都以“正王道”为主题,思想根基却大不一样。董仲舒是公羊学专家,(2)段落中的文句,是公羊家对“春王正月”的简要解释,符合董仲舒的身份。(b)在《汉书》原文中是依附于(2)的派生段落,是在天人关系上“《春秋》深探其本”的进一步释义。《通鉴》处理这段文字时,删去了公羊派标志明显的(2),(b)虽然被保留,但它与《春秋》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切断、掩盖。^② 孤零零的“正心以正朝廷”等词句,使人更容易想起“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的宋儒取向。对第一策的(3)段落需略作说明,它在《汉书》原文中的位置在(2)之前,为便于对比,我列表时将它挪至(2)下,但这并不影响整体判断。^③ (3)和(c)分别是《汉书》版“天人三策”和《通鉴》版“天人三策”最具代表性的文句,在主题上存在谈天人与谈教化的明显区别。

表3第三策中所列举的两个段落,(1)处于《汉书》原文第二段的位置。在它之前还有一段,是董仲舒对汉武帝再三垂问表示感激。随后在(1)段落中,

董仲舒从引用汉武帝制词中“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的语句开始,才是有针对性地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故我们可以把这个段落看作第三策真正的开篇,其主题仍然集中于天人关系。以强调德行积累为核心话题的(A)段落,在原文中处于(1)之后,是对制词中“上嘉唐虞,下悼桀纣”的回应。但司马光在重新编辑“天人三策”文本的过程中,不仅删去了董仲舒的套话,还删去了以天人关系为议题的(1)段落等相关文字,所以《通鉴》对第三策的取用,是从以谈论德行积累为主的(A)段落开始的。

经过司马光的处理,合而为一的“天人三策”,前后主题一贯,礼乐教化是治道最重要的基石,这个论点得到了彰显。而汉武帝、董仲舒共同关注的天人话题被从中抽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份文字与西汉时代环境的割裂,以至于失去了被称为“天人三策”的基础。

逐渐抛弃汉儒的天人感应说,修正汉代儒学“君

① 《汉书》,第2501~2503页,《资治通鉴》,第550页。

② 该段落《汉书》原文为“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徯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第2502~2503页)其中加重点符号者,皆为《通鉴》所删。

③ 《汉书》,第2500页。

权神授”的假设,是北宋中叶儒学的重大转向。^① 司马光对“天人三策”的选择性删节,符合这一潮流趋势。但他的工作,仅仅是儒学演变的一个体现,还是有更为具体的指向性内涵,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话题。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可以和《通鉴》对董仲舒对策年份的选择,合在一起考察。《汉书》关于董仲舒对策年份的记述,自相矛盾。《汉书》卷六《武帝纪》元光元年(BC. 134)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同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公孙弘曾两次参与贤良选拔,一次在建元元年(BC. 140),一次在元光五年(BC. 130)。^② 这两次时间皆与前揭《武帝纪》中元光元年的说法不合。同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在《天人三策》后有这么一句话“对既毕,上以仲舒为江都相。”董仲舒为江都相的时间当在建元初。^③ 所以《汉书·董仲舒传》暗示的对策时间,当为建元元年。同一部《汉书》,对董仲舒对策时间提示了三种可能: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元光五年。

纪传体史书,由于纪、传分行的体裁特色,本纪与列传同事异辞,甚至时空错谬,是常见现象。但这种现象无法为编年体包容。编年体正文,必须在相对确定的时间点上,对事件作出相对确定的叙述。有一事数说者,可别存“考异”以陈疑,却不能并见于正文。所以《通鉴》在处理董仲舒对策年份问题时,必须有所取舍。《通鉴》作者最终将对策时间定于建元元年。

关于董仲舒对策时间问题,前人已做过很多研

究。综观研究史,历来学者对《通鉴》这一取舍持否定态度者颇多。南宋学者洪迈据汉武帝策词内容,断言此事不可能发生在建元元年。^④ 清乾隆间齐召南等撰《前汉书考证》,又据董仲舒策文内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一语,抛开《汉书》与《通鉴》的已有说法,将对策时间定在建元五年(BC. 136)。^⑤ 王先谦《汉书补注》非难齐说,仍以元光元年为是。^⑥ 当然也有支持《通鉴》建元元年说的,如沈钦韩和苏舆。^⑦ 徐复观在1956年撰写的论文《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中,主齐说。而在1970年代的文章《先秦儒家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中,又是王先谦而非苏舆。^⑧ 朱维铮师《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一文,以《史记》相关记载覆案《汉书》,以元光元年说为是。^⑨ 相关论说还有很多,各有理据,不烦枚举。

笔者不想继续纠缠董仲舒对策于何时的问题,而是换个角度思考,司马光为何要将此事系于建元元年?是单纯的时间定位吗?《通鉴考异》卷一“世宗建元元年十月策贤良”条,陈述了舍弃元光元年说、取建元元年说的理由。但作者也不得不承认“仲舒对策,不知果在何时。”^⑩也就是说,《通鉴》作者虽然认为建元元年比元光元年更为合理,但也不能断定这件事必然发生在建元元年。我们在考虑《通鉴》作者最终因何选择了建元元年时,除了关注对策本身具体的时间点外,可以在更为宏观的层面考察《通鉴》的叙述结构。比如把眼光放长到《通鉴》对景帝末、武帝初这段历史的叙述。笔者以为,《通鉴》将董仲舒对策时间

① 相关讨论参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刘浦江《“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政治文化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日本学者小岛毅《宋代天谶论的政治理念》,载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1~339页。

② 关于公孙弘第一次参与贤良选拔,《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案《汉书》卷六《武帝本纪》,公孙弘卒于元狩二年(BC. 121),前揭弘本传云其卒年八十。据中国传统的纪岁方式,弘年六十当在建元元年(BC. 140)。公孙弘第二次参与选拔,弘本传明确指出是在元光五年。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董仲舒传》云“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第3127~3128页。

④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六“汉举贤良”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6年,第286~287页。

⑤ 齐召南等《前汉书考证》卷五十六“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句下,四库本《前汉书》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5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1984年,第353页下。

⑥ 王先谦《汉书补注》卷五十六,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光绪二十六年长沙王氏校刊本),1995年,第1141页下。

⑦ 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武帝纪》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条下,《续修四库全书》第266册,第30页下、第31页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苏舆《董子年表》附载氏著,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92年,第479页。

⑧ 徐复观《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载氏著《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72页。《先秦儒家的转折及天的哲学的完成》载氏著《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具体参该文注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5页。

⑨ 朱师文章初刊于《上海图书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上海图书馆,1982年。后收入《中国经学史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5~95页。

⑩ 《通鉴考异》卷一,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1919年,第5b、6a页;另,《资治通鉴》第556页“天子擢为中大夫”条下亦附。

定在建元元年,固然有时间择取上的倾向性,但这样的安排,同时是和《通鉴》上一卷即第十六卷末的特殊处理共同构成了汉武帝朝历史叙述的结构。经删节而发生主题变化的董仲舒对策,在这个结构中承担着司马光施政理念表述的功能。

五、司马光的施政理念

在传统文献中,以“秦皇汉武”作为反面历史教材,有很深的渊源。^①而司马光以反面定位的形式叙述汉武帝,又有非常特殊的时代语境。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庚辰(十七)日,司马光在经筵读讲《通鉴》,借汉史萧规曹随的典故,暗示宋神宗轻易变法的不妥当性。^②两天后,同样是在经筵,变法派干将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言论予以了回击。吕惠卿说“臣前日见司马光以为汉惠、文、景三帝皆守萧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乱,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乱……光之措意,盖不徒然,必以国家近日多更张旧政而规讽。又以臣制置三司条例,看详中书条例,故有此论也。”^③

从吕惠卿批评司马光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两点:第一,司马光在向宋神宗阐述西汉史观时,曾将汉武帝作为变法而乱的典型;第二,司马光以这样的思路诠释西汉历史,其真正的目的在于抨击熙宁二年初以来,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后实施的新政。吕惠卿对司马光的解读是准确的。司马光的确非常擅于利用《通鉴》表达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乃至通过诠释历史提出自己的政治理念。^④

已经有学者指出,宋神宗变法的最终目的,在于收回燕云十六州。王安石的理财,只是这一战略目标的前期准备。但无论是王安石的富国手段,还是宋神宗的强兵目的,司马光都持激烈的反对态度。^⑤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时,汉武帝时代作为反面经验教训,是司马光不断使用的论据。早在变法正式开始之前,他就曾利用经筵讨论的机会,对王安石的理财理论提出过直接质疑,其中就以汉武帝的失误为历史依据“介甫曰:‘……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⑥元丰五年(1082)寓居洛阳时,因健康出现令人担忧的状况,司马光预作了一份《遗表》,意欲对朝政再进一言。在《遗表》中,他批评宋神宗试图兴致武功而用兵域外,反而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所惜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师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借使能踰葱岭、绝大漠、蹙皋兰、焚龙庭,又何足贵哉!”^⑦汉武帝再一次在其笔下扮演了反面典型。

司马光在《通鉴》中给汉武帝盖棺定论,认为他统治时期的很多行为,使得他“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但这样一来,司马光必须解释,为什么秦始皇的行为最终导致了秦朝的灭亡,而汉朝却依然能在汉武帝身后存在。他以为,之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单一,其中关键一点是汉武帝能“晚而改过”。^⑧这个观点,又和熙宁七年(1074)司马光指陈朝政阙失时的议论若合符契。到这一年,新政实施以来的很多负面效应逐渐暴露,恰巧又遇上严重的旱灾。宋神宗除了走祈雨、减

① 如陈寿在《三国志》卷三《明帝纪》末尾,发表评论,批评魏明帝“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115页。散落在唐宋文献中的类似评论,更是不胜枚举。

②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三《英宗皇帝·经筵(神宗附)》:“司马光读《资治通鉴》至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故规,因言参以无事镇海内,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汉常守萧何之法久而不变,可乎?’光曰‘何独汉也。夫道者,万世无弊,夏、商、周之子孙,苟能常守禹、汤、文、武之法,何衰乱之有乎?’上曰‘人与法,亦相表里耳。’光曰‘苟得其人,则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虽有善法,失先后之施矣。故当急于得人,缓于立法也。’”李之亮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8页。

③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三《英宗皇帝·经筵(神宗附)》,第939页。

④ 相关讨论,参冀小斌“Mirror for Government: Su-ma Kuang's Thought o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n Tzu-chih t'ung-chien”,载李弘祺(Thomas H. C. Lee)主编:《The New and the Multiple: Sung Senses of the Past》,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1页;姜鹏《〈资治通鉴〉文本的内外语境》,《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⑤ 邓嗣禹(Ssu-yü Teng):“A Fresh Look at Wang An-shih's Reform Movement”,载《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日本京都:同朋舍,1989年,第545~566页;冀小斌:《Politics and Conservatism in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Career and Thought of Sima Guang (AD. 1019~1086)》,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164页。

⑥ 司马光《八月十一日迎英对问河北灾变》,《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十九,第7a页。据《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上海涵芬楼影印宋刊本。这份奏对主要记录了熙宁元年(1068)八月经筵讨论的内容。

⑦ 司马光《遗表》,《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七,第17b、18a页。

⑧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第747~748页。

膳等正常程序之外,还下诏征求直言。^①司马光利用这次机会,全面盘点了新法的负面效应,并对朝政未来走向提出建议,其中又举到汉武帝的例子:“汉武帝征伐四夷,中国虚耗,贼盗群起,又丧贰师之军,乃下哀痛之诏”,于是达到“天下复安”的效果。^②这是劝宋神宗效法汉武帝不憚改过,及时更张易弦,以免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梳理司马光这几次利用诠释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来直接针对现实的论辩,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汉武帝时期聚敛社会财富以征伐四夷的举措,和宋神宗的新政在行动方向上有相似性,因此使得司马光对汉武帝时代在整体上作了负面定位,并以之为历史教训,对宋神宗进行劝诫。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再重新审视前文讨论的《通鉴》卷十六末与卷十七开篇的特殊处理,应该能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编排用心。

司马光对这段内容的特殊处理,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汉武帝时代的负面性。如前文所述,司马光对《通鉴》卷十六末尾的景帝后元三年相关内容进行了颠倒、错置处理,汉武帝即位初的封赏行为出现在旨在总结文景之治的“班固赞曰”前。这看上去既不合叙事理路,也不符《通鉴》处理同类文字的通例。但它达到了两个效果:第一,被后置的“班固赞曰”和一段源出《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共同为大转折来临之前的时代压轴,对汉初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总结,司马光因此有机会在末尾案加“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一语,指出汉朝的盛衰转换乃出于汉武帝的种种不恰当行为。而且这两段文字,与《通鉴》卷二十二完成对汉武帝时代叙述后所安置的两段史评,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是前后呼应的。第二,通过这样的处理,武帝即位初的细琐行为被停留在时代转折之前,真正拉开汉武帝时代序幕的重任,被留给了经司马光删节而使主题发生重大变化的董仲舒对策。如此一来,无论处于卷十六末尾的文字,还是处于卷十七开篇的文字,看上去都有足够的分量,这样的衔接更有利于彰显这一时代转折的意义,也让我们看到司马光对这段历史经验的重视。

司马光为什么要把拉开武帝时代序幕的重任,交由经删节后的董仲舒对策来完成?笔者以为,对汉武帝时期的历史经验作负面评判,并借它来反对宋神宗、王安石的新法,是司马光对新政理念的“破”。而这份删节后的董仲舒对策,则是司马光表达自身施政理念的工具。也就是说,司马光在“破”的同时是有所“立”的。因此,司马光将这份对策放在这么显眼、这么重要的位置上。

前文已经分析过,经删节后的对策,在主题上集中于礼乐教化。综观《通鉴》全书,“礼乐教化”可被视作司马光施政理念的基石。在整部《通鉴》的开篇之处,司马光强用倒叙法,留下一段著名的“三家为诸侯论”,突出对周天子认可三家分晋的批判,强调了“礼”作为政纲的重要性。^③而教化则是司马光认为的皇帝和政府首当先急之务。在《通鉴》中,带着这一论证目的取舍历史文献,远不止删节“天人三策”一例。张元先生曾撰文指出,对比《通鉴》和《后汉书》、《三国志》中的相关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司马光在总结东汉曹魏的政教成败时,刻意强调了儒学、教化的重要性,而抹去了刑法律令的作用。如东汉的永平之治,《通鉴》保留了汉明帝尊崇儒学、宣明教化的记载,而舍弃了汉明帝修明律令、严格执法的相关史料,使读者以为,国家治平的根本在于教化,而不在其他。^④这与删节“天人三策”的做法,如出一辙。

司马光认为教化是国家兴衰、政治成败关键的观点,也能在《通鉴》史论的安排上得到体现。以该书对东汉历史的记述为例,第一条“臣光曰”出现在建武元年(AD. 25),评论的内容是光武帝刘秀擢拔卓茂为太傅。此时的刘秀,业已称帝,在此之前,经历了通往权力巅峰漫长而艰难的路程,其间名将数十辈,大小百余战,司马光都不赞一词。偏是在看上去对宏观历史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的卓茂出现之后,司马光发表了关于东汉历史的第一条评论。司马光称刘秀在兵戈未息之时,就能想到旌表忠厚循良之臣,体现了孔子“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的精神,而这正是刘秀能

① 参《宋史》卷十五《神宗本纪二》熙宁七年相关记载,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第285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一“熙宁七年四月乙丑”条,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4年,第6137~6138页。

② 司马光《应诏言朝政阙失状》,《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十五,第7b、8a页。

③ 《资治通鉴》卷一,第2~6页。

④ 张元《司马光对东汉曹魏历史的理解》,载《宋史研究集》第24辑,台北:台湾“国立”编译馆,1996年,第77~106页。

够光复汉室、享祚久长的根本原因。^① 中元二年(AD. 57)刘秀崩逝,《通鉴》照例要组织一批盖棺定论式的文字。在这一次文字取舍中,司马光再一次体现了他的倾向性。在给刘秀定性的文字中,有这样的内容:“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并称赞他“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② 作为对刘秀的最后一次赞评,在文意上和前文指出的第一条评论,是相互呼应的,都在强调教化对于治平的重要功用。这一呼应,是光武一朝范围内的小结构呼应。细读《通鉴》中的东汉历史,我们还能找到一个 大结构意义上的呼应。《通鉴》卷六十八,是东汉历史的煞尾处。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AD. 219),孙权以及曹操的幕僚们向曹操劝进,被曹操拒绝,司马光借此发表了一通很长的议论,这也是《通鉴》中最后一条关于东汉历史的评论。在这条评论中,司马光对东汉的兴衰成败,进行了宏观总结,第一句话就是“教化,国家之急务也”。随后司马光指出,东汉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从光武帝到明帝、章帝,都能崇尚儒学,敦厚教化,在朝野间营造出了良好的氛围,所以即便和帝以降政局日益混乱,东汉也不至于即刻颠扑,这都是整个社会教化大行、根底深厚的缘故。奸雄如曹操,为何不敢废汉自立?司马光解释说,这是他“畏名义而自抑”,正是教化盛行的效验。最终,司马光以“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一语,结束了整段评论。^③ 把建武元年和建安二十四年的两条评论进行对比,很清晰地显示出,司马光对东汉历史的评论,是以“教化”始,以“教化”终的。

归纳前举数例,司马光在删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时,选择性保留了关于礼乐教化的内容,而删除了关于天人关系的讨论;在总结永平之治时,刻意掩盖了汉明帝的法治思想和行动,凸显了汉明帝尊崇儒学与教化的一面;在对整个东汉历史进行评论时,以强调教化始,强调教化终。可见,以教化为皇帝和政府施政的首要任务之一,把教化视作国家治平最重要的基石之一,是编纂《通鉴》时贯穿始终的基本

思想。这一思想明显影响了司马光如何剪裁史料。

在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来看司马光对《通鉴》卷十六末尾与卷十七开篇的特殊处理。司马光把汉武帝封舅等琐碎的行为前挪,让它们停留在景帝时代,在用两段分量极重的评论将汉初历史与武帝时代隔开之后,用以教化为核心议题的对策拉开了武帝时代的序幕。司马光让这份对策处于这么显眼的位置,和把第一条关于东汉历史的评论放在刘秀擢拔卓茂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起到了凸显、强调教化作为政治之基础的作用。综观汉武帝一朝的历史,不仅不符合以教化为至治基石的理念,且被司马光反复用作反面教材,用来提醒宋神宗。笔者以为,唯其如此,更能彰显司马光安排这个特殊结构的意义,也就是前文提出的,司马光在利用汉武帝时代作为劝阻新法的历史依据时,是有破有立的。司马光以汉武帝的行为破坏了汉初社会经济状况为例,告诉宋神宗不该做什么,又通过这份对策告诉宋神宗,该做什么。相比之下,严衍将司马光精心剔除的文字重新拾回,除了让这份文献可以和《汉书》中的原文相互替代之外,别无意义,且反过来消解了司马光的编纂意图。

司马光认为宣明教化应该成为政府的施政先务和基本职能,这一思想在《通鉴》编纂时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不仅这一思想本身与王安石通过政府行为理财的观念尖锐对立,这一表达方式也与王安石通过注解《周官》来阐扬理财思想的做法相映成趣。我们不必简单套用“刺激—反应”模式来解释司马光施政理念的生成理由,不应该认为其思想就是为反对王安石而存在的。从《通鉴》的编纂进程来看,西汉部分完成于治平四年(1067)初夏,东汉部分完成于熙宁元年(1068)底,都在新法正式推行之前。^④ 应该说司马光是有自己一贯的施政理念的,我们能从《通鉴》解释历史的方法中看到和王安石政治思想的差异性,但不能认定这种差异源自受新法刺激。但整体来讲,《通鉴》是一定语境下的作品,若仅从文献完备的角度对这部著作进行订补,很有可能会将它拽离原有的语境。

① 《资治通鉴》卷四十,第1285页。

② 《资治通鉴》卷四十四,第1428页。

③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第2172~2174页。

④ 梁太济《从各卷结衔看〈资治通鉴〉各纪的撰进时间》,《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姜鹏《〈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初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The Expression of Sima Guang's Political Ideas in Historical Compilation: From the Edition on the Original in *Zizhi tongjian bu*

JIANG Pe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433 , China)

Abstract: Ever since *Zizhi tongjian* (Comprehensive Mirror in Aid of Governance) came out , numerous works emerged on its annotation , revision , supplementation , rewriting , and continuation , among which *Zizhi tongjian bu* (Supplement to *Zizhi tongjian*) by Ming scholar Yan Yan is a representative at the aspect of revision and supplementation. In dealing with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3rd regnal year in the Houyuan Era of Emperor Jing of Han , recorded in Volume 16 , and those in the 1st regnal year in the Jianyuan Era of Emperor Wu of Han , recorded in Volume 17 , Sima Guang cited relative commentaries before factual narration , with adductions of abridged documents of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his personal political ideas. Yan discovered the reversal and abridgement , which deprived documents of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 and therefore made adjustments to the writing logic in these parts in his *Zizhi tongjian bu*. In addition , Yan deleted a piece of quotation from *Shiji pingzhunshu* (Equalization ,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t the end of Volume 16 in *Zizhi tongjian* and supplemented the abridged parts from Dong Zhongshu's *Tianrensan* (Three Schemes on Heaven and People) to the beginning of Volume 17.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ersions by Sima Guang and Yan Yan , the article aims to point out that certain seemingly misarranged parts in *Zizhi tongjian* actually implies Sima Guang's personal ideals. Many revisions , supplementations , and rewritings of *Zizhi tongjian* have , instead , erased the original context ,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political ideas which Sima Guang attempted to communicate through historical narrations.

Key words: Sima Guang; Yan Yan; *Zizhi tongjian*; *Zizhi tongjian bu*

[责任编辑 陈文彬]